

干支纪年因素与唐前期户籍编造的稳定

孙 宁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唐朝是古代中国户籍编造的成熟时期,形成了稳定的“三年一造”制度。而依照法令全面展开户籍编造的时间是武德六年,这一年的干支是癸未。据“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的规定,唐前期理应造籍的年份有45个。这一数据在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有15个年份相重合,从咸亨二年(辛未)到开元十九年(辛未)是为造籍一甲子,另有7组户籍编造之年的地支保持一致,表现为十二年为一周的造籍循环。由于“三年一造”制度引入了干支纪年的循环性,使得唐前期百余年的户籍编造有序展开,没有因为政局、年号、历法、地域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唐前期;武德六年;户籍编造;干支纪年;制度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1-0063-09

The Annals of Ganzhi(Heavenly Stems & Earthly Branches) and the Stability of Early Tang Dynasty'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UN Ning

(School of History & Tour Cultur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4)

Abstrac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ancient China had been matured in Tang Dynasty. It did practice on three-year cycle. The sixth year of Wude was a significant one for making the census register legally. The Ganzhi of this year was Guiwei(the Year of the Goat).According to the code *Zaoji yi Jinian* (Chou, Chen, Wei, Xu), there was 45 years for household surveys in principle. The data had the coincidence with 15 years in the Dunhuang-Turfan'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ocuments. Because of the cyclicity of the Ganzhi, the stability of Tang'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d been maintaining for over 100 years. It had virtually no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by these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situation, reign-titles,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so on.

Keywords: early Tang Dynasty; the 6th Year of Wud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ompiling; the annals of Ganzhi;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留存下来的户籍文书是社会秩序的真切反映,并不仅仅局限于赋役征发的角色。在考察各个王朝的历史进程及与之相应的户籍制度的演变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是皇权政治的重要标志。而唐代正处在古代户籍制度比较成熟完备的历史时期。就现有史料而论,我们能够看到唐代户籍制度比较完整的运行轨迹,首先体现在造籍有法(律、令、格、式)可依,而且法令的持续修订、制敕的及时处置都曾对造籍规定进行不断地调整,展示了因时而变的特点,但

[收稿日期] 2016-07-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五代户籍编造研究”(15CZS004)

[作者简介] 孙宁(1984—),男,历史学博士,现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及历史文献学。

始终有法可依。目前,唐代户籍编造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①、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②、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③等著作以及大量的单篇论文。这些论著集中阐述了唐代户籍制度的地位、户籍法令的内容与实际运用、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的价值与其编造细节、唐日户籍法令比较等问题。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拟解决唐代户籍编造各项制度确立的相对年份,并根据现有的唐代户籍法令和出土户籍文书,从纪年方式入手揭示出唐前期百余年户籍编造如此稳定的制度因素。

一、武德六年(癸未)——唐户籍编造诸制的建立年份

整体上看,初唐国制是承袭隋制的。以法律创设为例,武德元年(618)六月一日,李渊下诏以刘文静等人损益开皇律令,以宽简便时为标准,于当年十一月四日颁行。同时,下令左仆射裴寂、吏部尚书殷开山、大理卿郎楚之等人修撰新的律令,至武德七年(624)三月二十九日乃成,历时近六年。武德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④可见,唐初法律基本采用了开皇律令的框架体系。因此,在户籍法令方面,唐制的基础已于隋代固定下来^⑤。

据武德六年(623)三月令,唐代当时的丁中标准是:“以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同时,新王朝还设置了户等审定的具体等级,武德六年三月令言:“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同在武德六年三月,朝廷下令:“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⑥。上述诸条史料明确而完整地记载了武德六年(623)三月制定了丁中老小、三等户等(俟后分作九等)、计帐与户籍的编造周期以及籍帐的保存时间。可见,造籍之年的前三个月正是州县乡里忙于户籍编造之际。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唐玄宗在位时期。如《唐六典》卷3记载:“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原注:诸造籍起正月,毕三月。)”^⑦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敕称:“诸户籍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三月三十日纳讫,并装潢一通,送尚书省,州县各留一通。”^⑧并且,《通典》卷6《食货·赋税下》(仅有定户)、《册府元龟》卷486“户籍门”中亦有同样记载。

至于“团貌”一条需要一个补证,武德九年(626)十一月,魏征与封德彝、唐太宗争辩是否将“中男十八已上简取入军”时,太宗认为:

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是其诈妄。依式点入,于理何嫌!

但魏征指出不应竭泽而渔,应考虑到实际的赋役需要:

若次男以上并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陛下每云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诈之心。今之共治,所寄惟在县令刺史。年常貌阅,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⑨

①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龚泽铎译,中华书局,1984年。本文采用中华书局2007年新版,第10页。

② 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 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

④ 王溥:《唐会要》卷39定格令条,中华书局,1955年,第701页。

⑤ [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以下简称“《籍帐·概观》”),第84页。

⑥ 此三条史料分别出自《唐会要》卷85“团貌”条、“定户等第”条及“籍帐”条,分别为第1555、1557、1559页。

⑦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74页。

⑧ 《唐会要》卷85“籍帐”条,第1559页。

⑨ 《唐会要》卷85“杂录”,第1556页。

引文所谓“年常貌阅,委之州县”的说法,证明了武德年间已按照法令进行常规的貌阅,勘查编户民年龄的大小与丁中制、身状的同异与否。

但是,“定户三等”之制似乎早在武德二年(619)便有端倪:

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①

本令蕴含着丰富的内容。首先,民户有上中下三等之别。第二,户口的族群种类不同,依次为固有的中原民户、岭南民户、中南及西南地区的夷獠户、西北地区的蕃户及归附两年以上的蕃户。而中原民户及其三等定户之制隐藏在“每一丁租二石”的表述中。第三,不同地区的民户所对应的不同租税形式,考虑了各地区的生产环境。同时,内附蕃胡的三等定户乃至此后的九等定户标准皆与全国保持一致,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意义^②。总之,夷獠户、蕃胡户的称谓及其户等标准是在大一统的政治语境下产生的,表明隋唐户等制度也照顾了族群因素。关键是,这一制度应袭自前朝规定,武德二年的唐朝实力还是很难有效管辖岭南、西南以及西北地区的。

不过,在丁中制颁布的时间上似乎存在一个小矛盾,且看《通典》的记载:

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③

可上举户籍编造(包括丁中诸制)的确立时间都指向了武德六年。由于武德律令的颁行是在武德七年四月庚子^④,可在法令编纂之前,必定充分考虑过已施行了丁中、定户、造籍诸制^⑤。历来是实践在前,总结成文在后,武德七年颁布的律令体系只是肯定了此前的实际运转,不存在记载上的疏误。

武德六年方开始编造户籍,乃因各地区纳入唐帝国版图的时间有先有后,先期占领的中原地区才有相对成熟的条件执行。所以,武德六年以前户籍编造诸制的推行确有空间上的限制。

武德六年是唐代户籍编造的确立之年,这一观点亦可反推出来。《唐六典》载:

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原注: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后注籍而申之于省)。每定户以仲年(原注: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原注:丑、辰、未、戌)。^⑥

鉴于《唐六典》的编撰和成书过程,是以开元之制为标准的,但这些制度是在损益前代的基础上形成的。季年造籍的“丑、辰、未、戌”秩序,应是始造年份的确立及其干支与“三年一造”的规定共同形成的,因为武德六年的干支是癸未。这当非巧合,而是始造年份对后续的制度改进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唐初关于户籍编造的武德律令在继承隋代的同时也应有自己的独立发展。隋代主要在隋文帝开皇前期曾大规模阅实户口,整顿户籍。而《隋书》卷24《食货志》乃至卷67《裴蕴传》均未说明当时户口统计与籍帐制度的细节,甚至对户籍编造的具体时间也语焉不详,目前所能了解的只是阅实户口、析大户为小户、输籍之法 and 相纠之科等户籍整顿的措施^⑦。隋志提到每年正月五日的“依样定户”这一

①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6《食货·赋税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106页。此条史料的时间,《通典》将其置于武德二年。而《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则系于“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之后,入“赋役之法”中。但就“每丁租二石”而论,《通鉴》卷187、《唐会要》卷83租税上、《册府元龟》卷487《邦计部·赋税一》皆纪作武德二年。

②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2-183页。

③ 《通典》卷7《食货·丁中》,第155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5页。

⑤ [日]池田温:《籍帐·概观》,第118页注76。

⑥ 《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第74页。

⑦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680-681页、1574-1576页。

时间,与唐代的造籍时限相近(起正月,毕三月),但唐代户籍是三年一造制度,两者并不完全相同^①。因此,武德时期系统性的新户籍办法的及时颁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也避免了改朝换代时那种千篇一律的“轻徭薄赋”的历史叙事。

二、唐前期例行造籍年份

在前朝史籍中,唐代户籍三年一造的制度渊源也有若干间接线索。南齐高帝即位,下令虞玩之与骁骑将军傅坚意检查簿籍。建元二年(480)下诏深刻地指出黄籍中的伪弊问题,玩之上表奏对道: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盖以世属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诏逮幽愚,谨陈妄说。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共却七万一千余户。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部,倍不可念。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若有虚昧,州县同咎。^②

这是一份内涵丰富的奏表,不但揭示了南朝刘宋孝建元年户籍的可靠性,还肯定了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籍的有效性。同时,他还建议建元元年籍必须要做到杜弊清源,为新生的南齐政权提供一份符合实际的户籍统计。

奏表提到了刘宋后期的户籍情况:“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四号黄籍”,有学者认为分别是指泰始三年(467)、泰始六年(470)、元徽元年(473)及元徽四年(476),并进一步指出刘宋已如后世的唐代,形成了三年一造籍^③。虞玩之在所言“四号黄籍”后,便述及“今建元元年书籍”,这意味着建元元年(479)是造籍之年,此与元徽四年(476)相隔正好三年。再据虞氏之表,“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可见元嘉二十七年(450)与孝建元年(454)是相邻的两个造籍年,此处相隔四年。而从孝建元年籍到泰始三年籍则有十三年的间隔,其间至少没有完全遵循三年一造。

目前出土的早于唐朝的十六国户籍实物,如吐鲁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④、敦煌文书 S.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⑤、德藏吐鲁番文书 Ch.6001 残片背面的《北凉承阳二年(426)十一月籍》^⑥,及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中的户籍部分^⑦,这些户籍文书在政权和制作时间上缺乏一定的连贯性。虽然与唐代同类文书在书写材料(纸本)、反映的地域(西北地区)、造籍时间(部分属于年初造籍)上具有相似性,但由于早期纸

① 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2卷《隋唐五代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② 萧子显:《南齐书》卷34《虞玩之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08-609页。

③ [日]池田温:《籍帐·概观》,第47页。

④ 荣新江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第176-179页。

⑤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3-5页。

⑥ 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A) Introduction & Texts, Tokyo: The Toyo Bunko, 2001, p.9.

⑦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6-22页。

本户籍资料的缺乏,也很难看出“三年一造”制度的定型。上文已言明,武德户籍法令与前代不相一致,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而据《通典》对历代官员政绩考核情况的总结,一般都遵循着《尚书·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标准^①。中央政府对官员政绩实行三年一考,以便擢升或罢黜,而户口增减与是否是考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唐代户籍三年一造也就顺势配合了官员政绩的考核周期。

那么,严谨地讲,从刘宋时期开始,造籍制度仅仅大概固定为三年一造^②。经过南北朝及杨隋时期的历史积淀,户籍“三年一造”制度在唐朝确立起来。根据武德六年各项户籍法令的颁布以及“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之制^③,唐前期应当造籍的年份是:

表 1 唐代前期例行造籍年份	
轮值年份	对应的年号纪年
未	武德六年 623、贞观九年 635、贞观二十一年 647、显庆四年 659、咸亨二年 671、弘道元年 683、证圣元年 695、景龙元年 707、开元七年 719、开元十九年 731、天宝二年 743、天宝十四载 755
戌	武德九年 626、贞观十二年 638、永徽元年 650、龙朔二年 662、上元元年 674、垂拱二年 686、圣历元年 698、唐隆元年 710、开元十年 722、开元二十二年 734、天宝五载 746
丑	贞观三年 629、贞观十五年 641、永徽四年 653、麟德二年 665、仪凤二年 677、永昌元年 689、大足元年 701、开元元年 713、开元十三年 725、开元二十五年 737、天宝八载 749
辰	贞观六年 632、贞观十八年 644、显庆元年 656、总章元年 668、永隆元年 680、如意元年 692、长安四年 704、开元四年 716、开元十六年 728、开元二十八年 740、天宝十一载 752

说 明:各年号纪年后为相应的公元纪年。

表 1 将唐前期两个政权(唐与武周)、七位皇帝(不含少帝李重茂)统治下的 24 个不同年号都分门别类地系于地支之下,并无纷乱之感。至天宝十四载(755)为止,总计涉及了唐前期按照造籍年次而理应造籍的 45 个年份,占唐前期 138 年历史的三分之一强。这应是东汉末年以来第一次建立了连续的全国范围内的户籍编造秩序。同时,这 45 个造籍年份是在丑、辰、未、戌(“造籍以季年”)四个地支的框架下得以循环实现的。

当然,针对唐前期户籍编造的有序局面,我们可以说这时的唐朝处于国力上升时期,即所谓“国步日亨”;也可以说是地方官吏的勤勉,尽心尽力,奉公守法等等。但是“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制度中的巧思不可不察,仅仅依靠“三年一造”的一纸规定在实际运作上无法保证唐前期户籍制作的稳定。接下来,需要从出土户籍文书中为这份表格找到证据支撑。

三、出土户籍文书与百年造籍的稳定

学界对唐代户籍文书进行集中地整理,刊布的成果主要有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的录文部分,拼合、辑录了不少唐代户籍、计帐类文书^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收录了敦煌出土的户籍、田簿等文书^⑤。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4 至 10 册收录了近 40 年吐

① 《通典》卷 15《选举·考绩》,第 366-373 页。
② 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 251 页。
③ 《唐六典》卷 3《尚书户部》,第 74 页。
④ 山本达郎、土肥义和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第 2 编《户籍编》在池田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了该类资料,东洋文库,1984-1985 年。
⑤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

鲁番发现的唐代户籍、手实、计帐文书多种,极大促进了唐代户籍制度的深入研究^①。其中,韩国磐对其所见唐代各类户籍文书中的各个时间作了集中整理,并列有相应表格,直观易览^②。荣新江总结了当时所能掌握的唐代户籍文书的制作时间,统计比较全面细致,文书的来源也很清晰^③。新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又出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户籍文书^④。本节将根据讨论主旨对其有所取舍,补其未备,目前所见户籍实物或其他官文书提及的户籍有:

表 2 唐代户籍文书所见造籍年份

造籍年	公元纪年	证据资料
永徽元年籍	650(戊)	《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帐后口苟户籍》 ^⑤
龙朔二年籍	662(戊)	《唐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⑥
咸亨二年籍	671(未)	《唐咸亨二年(671)西州高昌县感仁等户籍》 ^⑦
垂拱二年籍	686(戊)	《唐永昌元年(689)西州高昌县籍坊勘地牒》 ^⑧
天授三年籍	692(辰)	《武周天授三年(692)户籍稿》;《周天授三年(692)西州籍》 ^⑨
证圣元年籍	695(未)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帐后柳中县籍》 ^⑩
圣历元年籍	698(戊)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697)帐后柳中县籍》 ^⑪
大足元年籍	701(丑)	《武周大足元年(701)西州柳中县籍》;《周大足元年(701)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 ^⑫
先天二年籍	713(丑)	《唐先天二年(713)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 ^⑬
开元四年籍	716(辰)	《唐开元四年(716)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唐开元四年(716)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 ^⑭ 《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唐开元四年(716)西州高昌县安西乡安乐里籍》 ^⑮
开元七年籍	719(未)	《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载户主郭玄昉妻名下有“开元七年籍后被其年十二月十三日符从尊合贯附”; ^⑯ 俄藏《唐开元七年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 ^⑰

①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10册,文物出版社,1983-1991年。

② 韩国磐:《唐籍帐残卷证明了唐代造籍均田之勤》,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97-132页。

③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④ 荣新江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分别见于第17、53、61-62页。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6册,第101页。一般而言,户籍的三年一造,即上次造籍与本次造籍三年间隔内的户口异动,需要反映在本次所造户籍上。贞观二十一年适逢造籍,三年后即永徽元年,所以荣文对此籍时间的判定可以接受。参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⑥ 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60-61页。这是特殊的僧道户籍,由于编造年限上与民籍一致,暂且当作一个造籍年份的实物使用。可参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孙宁:《唐代前期非农人口籍帐的编造与其背景》,《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

⑦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7册,第129-134页。

⑧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7册,第407-408页。

⑨ 前者出自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17页;后者出自[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95页。

⑩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7册,第218-219页。

⑪ 按照籍注惯例,本件属于武周时期圣历元年的户籍。

⑫ 前者出自《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8册,第112-117页;后者出自[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24-26页。

⑬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27-29页。

⑭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30-35、100-104页。

⑮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8册,第280-286、314-319页。这件“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的籍注中有“先天二年帐后附”的内容,荣新江前揭文因之判为开元四年籍。

⑯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36-43页。

⑰ [俄]丘古耶夫斯基著,王克孝译:《敦煌汉文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0-72页。

续表 2

造籍年	公元纪年	证据资料
开元十年籍	722(戌)	《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唐开元十年(722)西州高昌县籍》两件; ^① 《唐开元七年(719)帐后西州籍》 ^②
开元十三年籍	725(丑)	《唐开元十三年(725)西州高昌县籍》两件 ^③
开元十六年籍	728(辰)	《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籍》 ^④
开元十九年籍	731(未)	《唐开元十九年(731)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 ^⑤
开元二十三年籍	735(亥)	《唐开元二十三年(725)西州籍》、《唐开元二十三年(725)甘州张掖县□□乡籍》; ^⑥ 《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 ^⑦
开元二十九年籍	741(巳)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 ^⑧
天宝三载籍	744(申)	《唐天宝三载(744)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 ^⑨
天宝六载籍	747(亥)	《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 ^⑩
天宝九载籍	750(寅)	《唐天宝九载(750)交河郡籍》; ^⑪ 龙谷藏 4158 号 ^⑫
乾元三年籍	760	《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 ^⑬
“大历四年籍”	769	即上言《大历四年手实》 ^⑭

说 明: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为界,最后两个年份属于唐后期开启时的造籍年。

表 2 与“理应造籍年份”的表 1 可以互相发明,首先证实的是武德六年户籍编造规定的颁布之可靠,后即著于武德七年律令。第二,我们发现了公元纪年的三年间隔(亦即每隔两年一造),表明“三年一造”制度的存在,并被切实执行。同时,从公元纪年观察,很容易看到表 2 中的开元二十三年与二十九年、天宝三载、六载与九载没有出现在表 1 中。可见,唐令规定的造籍以“丑、辰、未、戌”之制并未贯彻始终。池田温根据传世史料确认了开元十九年籍(未年)的存在,进而指出造籍年次发生了变化是在开元二十年代^⑮。1970 年代以来,随着《唐开元十九年(731)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以及《唐开元二十

①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36-43、44、107 页。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8 册,第 308-310 页。荣新江前揭文判为开元十年籍。
③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107 页。
④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108 页。
⑤ 《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 8 册,第 403-407 页。
⑥ [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第 72-75 页,图版 3、4。
⑦ 录文见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跋》,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八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40-146 页。
⑧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⑨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47 页。
⑩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48、49 页。
⑪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118 页。但文书仅存一行,不知年代判定所据是何。
⑫ 转自[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第 63 页。
⑬ [日]池田温:《籍帐·录文》,第 72-90 页。
⑭ [日]池田温:《籍帐·概观》,第 178-179 页。学界认为该文书虽冠以“手实”之名,但已是正式的户籍,可能是唐前后期历史的差异所致。
⑮ [日]池田温:《籍帐·概观》,第 102 页。

三年甘州张掖县□□乡籍》、《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籍》、《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的逐渐公布^①,可以明确就是在开元十九年籍后,造籍年发生了变动。这是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的敕令改变了造籍日期所致^②。

阿斯塔那 509 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蒲昌县定户等案卷》表明^③,在开元二十一年(酉年)的十二月,亦即原规定的定户之年岁末,蒲昌县还正常完成了评定户等的工作。但接下来的一年——开元二十二年,官府并没有遵循原定时间造籍。玄宗在当年五月颁布了“定户之时,百姓非商户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将入货财数”的诏令^④,表明开元二十二年(734)重新开始了户等评定工作。造籍也从而被推后了一年。所以,造籍年次便从以前的“丑、辰、未、戌”变为“寅、巳、申、亥”^⑤。改变了的造籍年次依然围绕干支纪年的轮值方式,与“三年一造”之制相结合,保证了玄宗统治后期户籍编造的有序性。

百年造籍的稳定性值得深思。表 2 中明确记载的造籍年份涉及了太宗、高宗、武后、玄宗四个时期。可见这一制度没有因为君主的变更而中断。而属于武周时期的户籍实物中保存了四个造籍年份,占表 1 中武则天当政时期(包括临朝称制)七个造籍年份的二分之一强。武后于光宅元年(中宗嗣圣元年、睿宗文明元年,甲申,684)临朝称制,垂拱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下诏,复政于皇帝。以皇太后既非实意,乃固让。皇太后仍依旧临朝称制,大赦天下。”^⑥而出土文书保存了垂拱二年(丙戌,686)造籍的信息。天授元年(载初元年九月,庚寅,690)改国号为周,而据吐鲁番新出《武周天授三年(692)户籍稿》,可见唐朝确立的户籍三年一造制度没有随着国号的改变而改变。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变历法,施行周正,以是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以原正月为一月。至久视元年(圣历三年)十月恢复旧历,行用近十年,其间适逢三次造籍,皆有户籍实物与之对应。故历法的变化也未改变“三年一造籍”的经济国策^⑦。造籍制度的稳定性在武周政权的执行方面表现良好,没有因为政治变动而出现异常。本表出现了先天二年籍,对应了表 1 例行造籍的“开元元年”,因为先天二年十二月才改元开元。这只是按照既定的造籍轮值干支而顺延,尤其可见干支纪年因素对户籍编造的切实影响。

唐前期的百年造籍(武德六年到开元十九年、开元二十年代到天宝末年),没有因为君主易位、国号更改、历法变动、年号迭换而受到影响,地方官府完全按照干支纪年的轮值顺序进行户籍编造。据表 2 各文书的年份信息,我们发现从咸亨二年到开元十九年是造籍一甲子,六十年后的造籍轮值又重新开始。而永徽元年与龙朔二年、垂拱二年与圣历元年、大足元年与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与开元十三年、开元四年与开元十六年、开元七年与开元十九年、开元二十三年与天宝六载,以上对比各组的地支是一致的,乃十二年一循环。所以,相对“三年一造”的数字约束,干支纪年的循环性引入户籍编造的制度设计中,使其更具稳定性,为州县及乡里的管理者带来了方便。

在本文结束之时,需要比较一下唐与北宋的户籍编造周期。唐代户籍“三年一造”之制,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书皆有确证,兹不赘论。研究认为,五等丁产簿是宋代户籍制度十分重要的一种。从

① 所引户籍文书的出处可参表 2。

② 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 275-276 页。

③ 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9 册,第 97-100 页。

④ 《唐会要》卷 83,第 1533 页。

⑤ 张荣强:《唐代造籍日期辨正》,载《河北学刊》2010 年第 1 期,以《也谈唐代的造籍日期问题》为名收入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

⑥ 《旧唐书》卷 6《则天皇后本纪》,第 118 页。

⑦ 本观点受张荣强的启发,见氏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第 275 页注 4。

北宋建立初年起,五等丁产簿的制作即作为主户的户籍制度而存在^①。北宋初,除了原来的九等定户制被五等制代替外,唐代户籍三年一造的制度仍在沿用。建隆元年(960)十月:“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仍请三年一责户口之籍,别定升降。从之”^②。后来才改为逢闰年造五等丁产簿。至于五等丁产簿由三年一造改为逢闰年一造,应与宋代闰年造闰年图有关。太平兴国二年(977)闰七月:“有司上诸州所贡闰年图。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贡地图,与版籍皆上尚书省。国初以闰为限,所以周知山川之险易,户口之众寡也。”^③所谓“故事”,应借鉴了唐代的经验:“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偕上省”^④。研究者指出为节约成本,此后宋代五等丁产簿的撰造时间逐渐与闰年造闰年图的时间同步^⑤。换言之,北宋的“主户户籍”由初期遵循唐制的“三年一造”逐渐调整为“逢闰年一造”。

于是,有学者指出唐代户籍的三年一造与北宋“主户户籍”的闰年一造仅仅是撰造时间上的区别^⑥。唐人贾公彦在注释《周礼·地官》小司徒条“及三年,则大比”时,认为之所以每三年一次按比人口,是由于“三年一闰,天道有成”。此亦可作为唐代户籍三年一造的理论基础。当然,这或是当时户籍造写周期的设计根据。北宋肇建,改成“闰年一造”,以示维新,优于前朝。实际上,“三年一闰”并非农历的恒定标准^⑦,所以历法继续通过“五年二闰”、“十九年七闰”等形式进一步推求天体运行规律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平衡。因此,从农历的闰年规律而言,本文并不承认作为北宋非常重要的“主户户籍”——五等丁产簿,会按照如此不均衡的方式展开编造,应当还是遵从“三年一造”的运作经验。所以,北宋五等丁产簿“逢闰年一造”的编造周期只是一种说辞而已。

干支纪年的循环性与“造籍以季年”的法令,使史籍表现了三年之内“必经造籍”的源于制度的自信。例如《唐律疏议》犯流应配条曰:“若流、移人身丧,家口虽经附籍,三年内愿还者,放还”,疏议曰:“籍谓三年一造,申送尚书省。流人若到配所三年,必经造籍,故云‘虽经附籍,三年内听还’。”^⑧因此,干支纪年方式的循环往复,同“三年一造”户籍法令相结合,保证了制度层面的造籍稳定,在唐前期呈现了一种长达百年的有序状态。这也是唐代国家控制力、社会繁荣的体现之一。

[参 考 文 献]

- [1] 荣新江,等.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J].西域研究,1995,(1).
- [3] 韩国磐.唐籍帐残卷证明了唐代造籍均田之勤[A].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吐鲁番学论文集[C].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97-132.
- [4] 张荣强.汉唐籍帐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5]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6]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6、7、8)[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986、1987.
- [7] 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7,(3).
- [8]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铎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① 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② 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26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第410页。

④ 《唐六典》卷5“职方郎中员外郎”条,第162页。

⑤ 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⑥ 戴建国:《宋代籍帐制度探析——以户口统计为中心》,《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⑦ 唐宋时期闰年情况可参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一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83-149页。

⑧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议》卷3,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